

两汉思想史

Sixiangsh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复观 著

第二卷



两汉思想史

徐复观 著 第二卷

Lianghan Sixiangshi



自序

我在一九七二年三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了《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①,是作为计划中的《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而写的,所以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此处所汇印的七篇专论,便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二。因为我要继续写下去,预定还有卷三卷四的印行。

我曾指出过,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一般人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在精神、面貌、气象、规模上,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我以流离琐尾的余年,治举世禁忌不为之旧学,也有一番用心所在。

这几年来,颇有好学之士,向我问到治思想史的方法。在这里特郑重说一句:我所用的,乃是一种笨方法。十年以前,我把阅过的有关典籍,加以注记,先后由几位东海大学毕业的同学为我摘抄了约四十多万字,其中有关两汉的约十多万字。等到我要正式拿起笔来时,发现这些摘抄的材料,并不能构成写论文的基础。于是又把原典拿到手上,再三反复;并尽可能地追寻有关材料,这样才慢慢地形成观点,建立纲维;有的观点、纲维,偶得之于午夜梦回,在床上穷思苦索之际。即使是如此,也只能说我的文章,在治学的途辙上,稍尽

^① 此书增加了两篇重要文章后,于一九七四年五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台湾版。

了点披荆斩棘之劳，断乎不敢说没有犯下错误。李唐有自咏其画之句谓“看之容易画时难”。二十多年来，才渐渐识得一个“难”字。

只有在发展的观点中，才能把握到一个思想得以形成的线索。只有在比较的观点中，才能把握到一种思想得以存在的特性。而发展比较两观点的运用，都有赖于分析与综合的功力。我的这种功力虽然不敢说完全成熟，但每写一文时，总是全力以赴，以期能充分运用发展与比较的观点。这可能是我向读者所提供的一点贡献。

这七篇文章，都是作为独立性的论文来写的，所以重复甚至论点不大一致的地方，在所难免。这只有期待全书写成后，作一次总的调整。几十年来，把王充的分量过分夸张了。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使他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这种揭破的工作中，应当引起研究者乃至读者自身对感情与理智的反省。就东汉思想而言，王充的代表性不大。所以我把西汉还有几篇文章写完后，便接着写东汉的一群思想家。

此书曾经香港中文大学印行。这里增加了两篇文章，并订正若干内容，恢复被中文大学出刊组删去的侧线，由学生书局的朋友，印行增订版，实感厚意。又本书订正部分，多得力于友人刘殿爵教授的教示，感佩难忘。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浣水徐复观序于九龙寓所。



目 录

自序·····	1
《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1
一、《吕氏春秋》内容之检别·····	1
二、邹衍学派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3
（一）有关邹衍的若干考查·····	4
（二）从邹衍到《吕氏春秋》·····	5
三、从《夏小正》到《十二纪·纪首》·····	8
四、《十二纪·纪首》的构造·····	11
五、明堂的问题·····	14
六、《十二纪·纪首》中的政令与思想的分配·····	20
七、《吕氏春秋》中的天人思想·····	26
八、《吕氏春秋》政治思想之一端·····	31
九、《吕氏春秋》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	34
十、《吕氏春秋》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39
十一、《十二纪·纪首》是古代天的观念演变的结果·····	48
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	53
一、刘邦统治集团中的文化问题·····	53
二、《新语》的问题·····	55
三、五经六艺的真实意义·····	58
四、秦亡的教训及儒道结合等问题·····	61
五、陆贾启蒙的影响·····	64

贾谊思想的再发现	68
一、时代背景及《贾谊传》	68
二、《新书》的问题	70
三、贾谊的思想领域	74
四、贾谊由秦所得的历史教训(附贾山)	77
五、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	81
(一) 现实政治问题	81
(二) 理想的政制	82
(三) 在人民上立基,发挥人民在知人用人上的积极功能	84
六、政治思想中,礼的思想的突出	86
(一) 礼的时代意义	86
(二) 礼在生活上的实现——容	88
(三) 对太子的教育	90
(四) 礼的社会意义	91
(五) 礼与经济问题	92
七、贾谊的哲学思想	95
(一) 道与术	95
(二) 从道的创生到六艺	97
(三) 《道德说篇》疏释	100
《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	108
一、问题的起点	108
二、时代背景	109
(一) 政治背景	109
(二) 学术背景	113
三、思想的分野	116
(一) 在研究方法上新角度的提出	116
(二) 老庄思想的分野	118
(三) 儒道思想的分野	122
四、道家的天、人、性、命	129
(一) 对道的描述	129

(二) 道的功用——创生	132
(三) 天与人	135
(四) 身与天下	137
(五) 性与命	140
五、精、神、精神、心	142
(一) 精	143
(二) 神、精神	145
(三) 心及形、神、气的生命的统一	147
六、道家政治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及思想上的融会贯通	150
(一) 政权的基本性格问题	153
(二) 贵后与神化	154
(三) 无为与法治	155
(四) 因与用众	157
(五) 势与君臣关系	157
(六) 用人与知人	159
(七) 君道——儒道法三家的融合	160
七、由儒家所作的全书的总结——《泰族训》的研究	163
(一) 边际思想转换之一——法天	164
(二) 边际思想转换之二——神化	165
(三) 边际思想转换之三——以“因”说明礼的起源	167
(四) 边际思想转换之四——由无为到简、大	168
(五) 由老庄的道转向儒家的经	169
(六) 礼与移风易俗	170
(七) 君子小人之辨	173
(八) 以“自得”为本	174
(九) 学问的重视及学问的方向	174
(十) 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175
八、结 论	176

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

——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	182
----------------------	-----

一、董氏思想与大一统专制政治之成熟·····	182
二、董仲舒的生平、人格及社会性·····	184
三、董氏的著作及《春秋繁露》成立的情形·····	189
四、《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	192
五、董氏的《春秋》学之一·····	195
(一) 董氏《公羊春秋》的传承问题·····	195
(二) 《公羊传》成立的情形·····	197
(三) 《公羊传》的本来面目·····	202
(四) 董氏《春秋》学的方法问题·····	203
六、董氏的《春秋》学之二·····	207
(一) 大纲·····	207
(二) 细恶及等差问题·····	209
(三) 君、臣、民的关系·····	211
(四) 受命、改制、质文问题·····	213
(五) 向天的哲学中的升进·····	217
七、董氏《春秋》学之三·····	222
(一) 华夷之辨·····	222
(二) 复仇与名节·····	223
(三) 正名思想·····	225
(四) 仁义法·····	226
八、董氏的天的哲学之一·····	229
(一) 天的哲学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发展·····	229
(二) 天的构造·····	229
(三) 天的性格·····	230
(四) 董氏的《洪范》五行的问题·····	237
九、董氏的天的哲学之二——方法问题·····	239
十、董氏的天的哲学之三——天人关系·····	242
(一) 天人一也·····	242
(二) 天与心性·····	246
(三) 天与伦理·····	251
(四) 天与养生·····	253

十一、天与政治·····	255
(一) 圣人、君道·····	255
(二) 五行与官制·····	258
十二、余论——《贤良三策》·····	259
扬雄论究 ·····	270
一、《汉书·扬雄传》及其若干问题·····	270
二、扬雄的时代·····	278
三、扬雄的人生形态·····	283
四、扬雄的辞赋·····	286
五、扬雄的《太玄》·····	292
(一) 草《玄》的动机·····	292
(二) 西汉思想大势及卦气说的出现·····	294
(三) 《太玄》的思想线索·····	298
(四) 《太玄》的构造·····	300
(五) 董仲舒以下之所谓“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之所谓“数” 的异同问题·····	305
六、扬雄的《法言》·····	307
(一) 《法言》的文体与构成·····	307
(二) 《法言》思想的骨干及对五经博士系统的严厉批评·····	309
(三) 《法言》中对孔子把握的限制·····	312
(四) 《法言》中的人性论及其教育思想·····	315
(五) 智性是扬雄真正的立足点，及其对当时迷妄的批评·····	318
(六) 学术性的人物批评·····	321
(七) 哲学家与史学家对蹠之一例·····	323
(八) 扬雄对历史的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批评·····	325
七、扬雄的政治思想·····	333
王充论考 ·····	344
一、引言·····	344
二、《后汉书·王充列传》中的问题·····	345

(一) 乡里称孝的问题	346
(二) 受业太学师事班彪的问题	346
(三) 谢夷吾推荐的问题	348
三、王充的遭遇与思想的关联	352
(一) 命运论的形成	352
(二) 对谗佞的痛恨	354
(三) 儒生文吏之争	355
四、王充学术思想的特点	356
(一) 重知识不重伦理道德	356
(二) 否定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358
(三) 反博士的学术系统	359
五、王充在学问上的目的	363
六、王充的理解能力问题	364
七、王充所运用的方法问题	366
八、王充疾虚妄的效率问题	370
九、王充的天道观	374
(一) 天是气抑是体?	374
(二) 天道自然	375
(三) 天生物的情形	376
(四) 天人不相知	378
(五) 王充之天道观与老子之天道观	379
(六) 王充天道观的目的	381
十、牵涉到的科学与迷信的问题	381
十一、王充的命运观	384
(一) 天命与命运的发展与演变	384
(二) 王充命运论的特色	384
(三) 命之由气而形而骨的实现	386
(四) 王充命运论的缺口	388
十二、王充的人性论	389
(一) 唯气的人性论	389
(二) 人性论上的折衷态度及宿命论的突破	390



《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一、《吕氏春秋》内容之检别

一般地说,经学是两汉学术的骨干,也是支持、规整两汉政治的精神力量。但两汉人上,许多是在《吕氏春秋》影响之下来把握经学,把《吕氏春秋》对政治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即视为经学所发生的影响;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性,这点却被人忽略了。所以为了打开探索两汉学术思想特性之门户,便应先从《吕氏春秋》所及于两汉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开始。当然,两汉思想,除儒家以外,还有其他思想的重大影响。例如道家思想,在四百年中,一直是一股巨流。而《管子》一书,对西汉前期的影响也相当巨大,其中有的便成篇于汉初。法家对两汉也一直保持一个有力的传承的系统。但第一,道家各家的影响,是界域分明,因而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影响;不是像《吕氏春秋》那样,以渗透融和之力,发生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影响。第二,各家的影响,都是系统分明,言者不讳,易为人所把握。但司马迁、刘向们,虽然都很重视吕不韦,可是在一般反秦风气之下,大家都讳其思想之所自出,故这样大的影响,却无人公开加以承认。所以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研究。

《吕氏春秋》,是对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大综合。我约略统计一下,引《诗》者十五,引《逸诗》者一。引《书》者十,其中称《书》者一,称《商书》者二,称《仲虺》者一,称《洪范》者二,称《周书》者三,称《书》而不明所出者一。引《商箴》、《周箴》者各一。引《易》者四。述《春秋》者一。与政治有关之礼,则皆组入《十二纪》中。《仲夏纪》、《季夏纪》言音乐,多与《礼记》中之《乐记》相通。引《论语》者一,引《孝经》者一。在诸子百家方面,《吕氏春秋》全书,系统合儒、道、墨、阴阳五家思想而成;因含有反对秦国当时所行法家之治的深刻意味,故

一字不提法家外,其余被它个别提到的,孔子者二十四。墨子者六,孔墨并称者八。又多次提到孔墨的许多弟子。提到老子者四。孔老并称者一。提到庄子者二,列子者二,詹何者三,子华子者五,田骈者二。尹文、慎子、田子方、管子者各一。提到出于邹衍之后,与邹衍系统有密切关连之黄帝者十一。提到邓析者一,惠施者六,公孙龙者四。提到白圭者三,提到农家的神农,后稷者各二。里面还有采用了他人的思想而未出其名者更多,有如孟子、荀子即其一例。而我这里举出的姓名和数字,只是粗略的统计,必有不少遗漏的。但即此已可推见其内容的宏富。

由上面简单的陈述,可以了解《吕氏春秋》,应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作重新发现性的研究。例如其中包含大量的古代史料,便值得与同一史料,但分见于先后或同时的各种典籍的,作一番比较性的研究。至于站在思想史的立场,应当把各种有关资料作比较而精密的处理,更不待说。同时,在一篇论文里,几乎不能包括每一重要角度的观点,也是非常明白的。本论文的目的,是站在吕氏门客的立场,来检别出其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由此以讨论它所给予两汉学术及政治上的影响。我所以用“检别”两个字,因为即使识力卓绝的司马迁,他所把握的《吕氏春秋》的重点,或者说是骨干,可能便与吕氏门客们自己衡定的,并不相符。这里应顺便提破一点,构成内容骨干部分的,在今日看来,不一定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按史公所重者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先《八览》、《六论》而后《十二纪》。在《答任安书》中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很明显地是以《八览》概括全书。然史公所见,与吕不韦自身之所期,颇有出入。《吕氏春秋》有《序意》一

篇,不缀于全书之后,而缀于《十二纪》之末;且自名其书为《春秋》,正系综括《十二纪》以立名;则在吕氏及其门客的心目中,此书的骨干,是《十二纪》而不是《八览》、《六论》,至为明显。《序意》^①说:

维秦八年^②,岁在涪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不可,无所遁矣。

上面一段话,正概括了《十二纪》的内容;而其著《十二纪》之目的,乃以秦将统一天下,而预为其建立政治上之最高原则。其《十二纪》所不能尽,或尚须加以发明补充者,乃为《八览》、《六论》以尽其意。《八览》之八,我以为殆指的是八方。有《始览》中之所谓“九野”,除中央外,实已举八方以为言;所谓“八风”,实指八方之风。则《八览》云者,乃极八方之观览。《六论》之六,我以为殆指的是六合。《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则《六论》者,乃穷极六合之论。《八览》、《六论》的性格,正如史公之所谓“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不仅吕氏的主要用心并不在此,并且因为他们太喜爱数字上整齐的形式,于是全书都有分其所不必分,重其所不必重,以牵就整齐的数字形式。全书到了《六论》,在内容上似乎有蹶竭之感。

今人杨树达,著有《读吕氏春秋记》。其中颇多精义。但他在《读吕氏春秋书后》一文中谓“古人著书,自序必殿居全书之末,何以吕氏书不尔?及读《史记》,而后知今本《吕氏春秋》经后人易置其次,非吕氏书之旧也。请以五证明之”。杨氏长于训诂而不谙于思想,不能把握当时吕氏及其门客思想之骨干及其渊源,故其所举五证,皆不足置辩。

二、邹衍学派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

《十二纪》是综贯天地人以建立政治的最高原则,这表现了他们很大的野心。要对此作一确切的了解,应当自邹衍的思想说起;因为《十二纪》的成立,是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结果。

（一）有关邹衍的若干考查

有关邹衍最可靠的纪录,还只有《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材料。因为邹衍在西汉是一种显学,所以史公在《孟荀列传》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写他的生平与思想。《孟荀列传》:

齐有三驺(与邹同)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敝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按上面所说的“在孟子前”,“在孟子后”,是史公有意以孟子作时间的定位。我们考查邹衍的生平,应以此为准。《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第为上大夫”。这都是泛叙,没有各人时间先后的严格意味。《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卫往,邹衍自齐往。”按此事史公系采自《战国策·燕策》,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七,《大戴记·保傅》第四十八,《新书》卷十《胎教》、《杂事》等。则邹衍在燕昭王初年到了燕国,是无可疑的。试以此一故事为中心,而将其他故事加以连缀,则据《史记·六国年表》,邹忌于西纪前三五八年(周显王十一年)以琴见齐威王;下距孟子游齐,早二十四年,故可谓“先孟子”。孟子于西纪前三二〇年(周慎靓王元年)游梁,梁惠王称之曰“叟”,假定此时为五十余岁。若此时邹衍三十多岁,亦可以与孟子相先后游梁。在年岁上可称为“后孟子”。孟子于西纪前三一八年由梁至齐^③。邹衍本齐人,亦可能由梁返齐,为齐宣王之客。燕昭王嗣位于西纪前三一一年(周赧王四年),若邹衍于燕昭王即位后之两三年内由齐来燕,则他此时约四十余岁。赵胜于西纪前二九八年封平原君,邹衍此时约五十余岁或六十岁左右;他参与燕昭王谋伐齐之策,而出外奔走,则他有“适赵”或“过赵”之可能。刘向《别录》所载邹衍破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陈义得当,为后人所不及知,故甚为可信。且平原君以公子的身份而好客,不必始于封平原君之后;史家惯例,常以某人最后之爵位称其

人之一生。公孙龙本为赵人,平原君对他的“厚待”,乃因其坚白异同之论,与邯郸解围后他劝平原君勿请封之事无关。则邹衍过赵,亦可在赵胜封平原君之前。乐毅于西纪前二八四年(赧王三十一年)伐齐入临淄,邹衍此时约七十岁左右。他的生平,应以此为准;《御览》十四引《淮南子》:“邹衍事燕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四月,天为之下霜”;这种传说,恐不太可信了。总结的说,他的活动,应开始于西纪前三二〇年前后;西纪前三一八、三一九年左右,返齐为齐宣王的稷下大夫;到了西纪前三一一年以后入燕。他在齐国约住了十年,他的“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④,应即完成于此时,这是他倾动当时王侯的资本。史公说:“如燕,昭王……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是《主运》乃入燕以后所作,不同于入燕以前所作的《终始大圣》之篇。所以他大事著书的时代,乃在西纪前三一八、三一九到三〇八、三〇九年的时代;此时的年龄作合理的推测,当在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他应生于西纪前三五六、三五七年,而死于燕伐齐前后,得年当在六十几岁到七十岁之间。

吕不韦相秦,在西纪前二四九年(秦庄襄王元年);他招集宾客,从事著书,应当始于此年;上距邹衍之死,约四十年左右。据《史记·孟荀列传》:“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邹奭)也文具(按:文饰其言而更加详尽)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可知邹奭在邹衍之后,他继承邹衍之说,而更有所发挥。又《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段话里面说,始皇因齐人奏之而始采用邹衍五德之说,殊未必然。因为应当是通过合著《吕氏春秋》的吕氏门客而采用其说。燕齐海上方士所传的,亦系邹说的更加附会;但由此亦可知邹衍生前死后,其说系不断地在发展传播^⑤。而《吕氏春秋·十二纪》,正是直承其发展而加以组织化,具体化的。

(二) 从邹衍到《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早亡。《史记·孟荀列传》述其思想之内容如下: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衰。^⑥因载其机祥度制。^⑦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按邹氏之书，史公时俱在；篇幅既多，内容当亦庞杂；史公并不信其说，故又谓“殆衍其言虽不轨（不合于常道），悦亦有牛鼎之意乎”。因此，上面的简单叙述，未必能尽其条理。兹就其内容略加分析，可列为四端：

一、其动机及归结，乃在以儒墨之道，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且系以儒家思想为主。此通观上文，即可明了。

二、以阴阳消息言灾异，予以加强对当时统治者行为上的压力。所谓“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因载其机祥度制”者是。

三、以五行言五德终始，对政治上传统的天命，赋予全新的内容，而使其更具体化。所谓“终始大圣之篇”，“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者是。其所作的《主运》，当亦属此类。

四、大九州说。此盖燕齐等地，当时已有海外交通，由此启发而来。

《吕氏春秋》未采第四项的大九州说。惟《应同篇》首段言五德终始一段，一般认为系采用第三项的邹衍之说。此证以《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为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次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等语，与《应同篇》首段的内容正合，当为可信。惟《应同篇》“代火者必将水……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数语，俞樾以为“浅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因“当吕氏著此书时，秦犹未并天下，所谓尚黑者果何代乎”。按邹氏五德终始之说，正所以激励时君，代周之火德而王，故为此悬记，秦乃得因而用之；俞氏见浅不及此。然以五行相胜（克）言历史的递嬗，实过于机械而不能含摄人在历史行为中所应占有的地位。远不及《汉书》卷六十四《严安传》严安上书有谓“臣闻邹衍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的话，为有

文化的意义。所以史公不信五德终始之说,而于《高祖本纪赞》则沿用文质互救之意义,以言历史发展应循的轨迹。吕氏及其门客,虽未否定五德终始的说法,但全书中仅在《应同篇》中引及,可知其并不重视。给吕氏及其门客以最大的影响的,仍在上述第二项。将第二项与第一项加以融合,并扩大其内容,此乃吕氏门客用心之所在。

第二项之所谓“深观阴阳消息”,须作进一步的解释。把向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的两个表达经验现象的名词,逐渐抽象化以言天象,乃至由此以言天道运行的法则,开始是在主管天文的这一部分人手上发展出来的。到了战国中期,才慢慢扩展到一般思想界。^⑧孔子只是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⑨言天道。所谓“阴阳消息”,是指阴长(息)则阳消,阳长则阴消而言。阴阳二气,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邹衍的“深观阴阳消息”,是如何“深观”法呢?《史记》卷二十六《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转),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张文虎因为不了解“散消息之分”的意义,所以认为“散字分字疑有误”。我以为散消息之分,是开始把抽象的阴阳观点,与经验界中的四时现象,结合在一起;把阴阳的消息,散布在四时中间去,由四时气候的变化,以看出消与息之分。只有这样,邹衍才可以“深观”。本来在通过《诗经》及《春秋》所代表的时代中,阴阳的观念,已由以日光为准,发展而为明暗、冷暖、气候的阴晴等观念。孔子以由四时生物言天道,这是春秋时代下及战国中期,一般的说法。温带气候,四时分明,冷暖殊致;邹衍进而把阴阳融入到四时中去,由四时的冷暖之度,以言阴阳消息之分,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他的一个划时期的创说。此一创说,形成了《十二纪·纪首》的骨干。十二纪,是把阴阳融入到四时十二月中去的。但就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看,邹衍是不是把五德运转,与阴阳消息,组成一个系统;亦即他是不是把五行视为由阴阳二气所分化而出,因而把五行也融入到四时中去,并不明了;而且我认为其可能性甚小。因为在他,是以阴阳消息为天道运行的法则;以五德终始为历史运行的法则;所以在《史记》中提到时,总是分作两事。

但邹衍的用心,依然是在以仁义、节俭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他所谈的阴阳消息,如何能与政治关连上,以实现他的仁义节俭的要求呢?我觉得《吕氏春秋》卷十三《各类篇》下面的话,值得注意:

黄帝曰:芒昧(高诱《注》,广大之貌),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